

# 戶口學校分割與中國大陸流動兒童 福祉：戶口歧視的中介效應與 戶口類型的調節效果<sup>1</sup>

武瑋\*、曹文華、張媛

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雖然早期研究發現學校分割會影響移民兒童的福祉，但很少有研究者關注戶口學校分割與中國流動兒童福祉的關係，其作用機制和調節機制更是猶未可知。基於全國代表性的追蹤樣本，本研究探討戶口歧視在戶口學校分割與流動兒童福祉的中介效果，同時分析戶口類型在戶口學校分割與戶口歧視對流動兒童福祉影響的調節效應。本研究使用中國教育追蹤調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兩期追蹤數據，樣本包括 1,226 名流動兒童。研究結果顯示：（1）當前中國大陸存在明顯的戶口學校分割現象；（2）學校流動兒童比例顯著負向影響流動兒童的學術福祉和行為福祉；（3）同伴歧視和教師歧視在學校流動兒童比例和學術福祉間有中介效果；（4）戶口類型對同伴歧視和學術福祉有調節效果。根據研究結果，本文提出相關理論實踐意涵和未來研究方向。

關鍵詞：戶口學校分割；福祉；戶口歧視；戶口類型；流動兒童

## 引言

戶口學校分割指本地戶口和外地戶口的學生集聚在不同學校，從而導致學校間存在顯著的戶口構成差異。過去四十多年，伴隨着政治體制改革、經濟快速增長和城鎮化進程的推進，中國大陸發生了大規模的人口內部遷移。隨着流動人口數量不斷增加，大量流動人口選擇將子女帶入城市地區繼續接受教育，跟隨父母進入城市地區的流動兒童與父母一起生活。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20 年全國流動兒童的人數

---

\* 通訊作者：武瑋（williamwu19@163.com）

已達 7,102 萬，較 2010 年上升一倍（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21）。隨着城鎮化和人口流動持續，中國大陸城市學校中預計將迎來愈來愈多流動兒童。

起初，由於戶口制度的限制，流動兒童不獲允許進入公辦學校就讀，只能就讀於教師質量和教育設施均遠低於辦學標準的打工子弟學校（Lu & Zhou, 2013）。近期，在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下，流入地政府開始向流動兒童提供義務教育服務，愈來愈多流動兒童開始獲允許進入城市公辦學校就讀（M. Yu, 2016）。事實上，城市地區高質量公立學校的教育機會有限，加上本地學生對高質量公立學校的需求高，大量流動兒童實際上就讀於低質量的公立學校（Gu & Yeung, 2020; Z. Liang, Yue, et al., 2020）。同時，為應對公立學校中流動兒童的比例快速上升，許多當地家長選擇通過擇校方式將孩子與流動兒童分開（Y. Chen & Feng, 2019; W. Liang, Liu, et al., 2019）。對於那些開始招收流動兒童的公立學校，招收的本地兒童愈來愈少，有些學校逐漸只能招收到流動兒童（Liu et al., 2017）。中國大陸流動兒童正在經歷一輪新的戶口學校分割，大部分流動兒童集中在城市地區少數學校。

現有西方研究表明，學校分割對少數族裔或移民兒童福祉具有不利的影響（Clotfelter, 2001; Vasque Heilig & Holme, 2013），但很少有研究關注戶口學校分割對中國流動兒童福祉的影響。少數幾項研究中，Lu & Zhou（2013）較早分析了由戶口學校分割導致的學校類型差異對流動兒童學術表現和孤獨感的影響。Ma（2020）使用全國代表性的調查數據，分析了由戶口學校分割帶來的學校質量差異對流動兒童學術表現的影響。D. Xu & Wu（2022）進一步分析了學校流動兒童比例對流動兒童學術表現的影響。然而，上述研究缺乏對中國大陸地區戶口學校分割整體程度和特徵的把握，亦缺乏對戶口學校分割影響流動兒童行為福祉的考量，且並未對戶口學校分割與流動兒童福祉間的中介和調節機制形成一致結論。

中國大陸義務教育初中階段的戶口學校分割究竟程度如何？有何特徵？戶口學校分割究竟給流動兒童的學術和行為福祉帶來了怎樣的影響？戶口學校分割對流動兒童福祉影響的作用機制是甚麼？在不同戶口類型的流動兒童間是否存在差異？目前鮮有研究作出回應。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使用中國教育追蹤調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的兩期全國調查研究資料，對中國義務教育初中階段的戶口學校分割程度和分布特徵進行測度和量化，同時在分析戶口學校分割對流動兒童學術和行為福祉影響，以及探究戶口歧視中介效應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戶口類型的潛在調節作用，以期填補現有研究空白的同時，促進並提升中國大陸流動兒童群體學術和行為福祉的整理。

## 文獻回顧

### 分段同化理論與戶口學校分割

分段同化理論是為理解移民兒童福祉而發展出一個主要分析框架 (Portes & Zhou, 1993)。與期待所有移民兒童統一適應不同，分段同化理論強調移民兒童適應的異質性，認為移民同化結果取決於移民父母和社區的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其他資源。部分移民兒童因父母的高社會經濟地位和有利的社區接納環境而實現向上流動，最終進入主流白人中產階級。相反，那些因父母缺乏家庭資源，並暴露在不利接收環境的移民兒童則將經歷向下同化，最終成為社會底層。僅有少部分移民兒童能在保留原有文化價值觀的情況下實現向上流動。儘管如此，大多數美國研究只發現少量的向下同化證據，即使對來自低收入家庭的移民兒童同樣如此 (Foner & Alba, 2008)。雖然三種同化都會發生，但向下同化的可能性最小。平均而言，大部分移民兒童的社會經濟狀況比父母一代要好 (Westin, 2003)。這些觀察被歸因於許多法律和政策都給予移民子女保護、機會甚至是福利 (Farley & Alba, 2002)。美國民權立法和平等權利行動方案在很大程度上為移民兒童提供了晉升於社會主流機構的機會，保護他們免於向下流動。在教育方面，移民子女有權享受從幼兒園到 12 年級的免費公共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移民子女的同化進程同樣存在群體異質性。有一篇文獻將美國廣泛的學校分割與教育成就的不平等聯繫起來，發現學校分割的學生比其他兒童的學術水平更低，更有可能輟學和從事危險行為 (Wells & Crain, 1994)。根據 Blau (1977) 的定義，分割是指不同社會特徵的群體或階層分別分布在不同區域，而非均勻地分布在同一區域內。學校分割指學校系統內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群體相互分離的程度 (Allen & Vignoles, 2007)。學校分割直接影響學校內的種族或民族構成，而這對學生成績具有重要的影響。對少數族裔兒童而言，在白人學生佔很大比例的非隔離學校上學，與更高的成就、更高的自我價值和更好的社會能力有關。還有研究發現，廢除種族學校分割不僅提升了黑人學生的學術表現，還顯著降低了輟學率和青年時期的犯罪率 (Guryan, 2004; Rivkin & Welch, 2006)。

在中國，學校分割可以作為流動兒童同化過程的一個重要機制，因為這些兒童面臨大量的結構性障礙。早期，由於缺少本地戶口，大部分流動兒童只能就讀於專門為流動兒童開辦的私立打工子弟學校，這些學校常常缺乏合格師資，且教學設施不足 (Y. Chen & Feng, 2019; W. Liang, Liu, et al., 2019)。近期公立學校陸續向流動兒童開放，但大量流動兒童實際上集中於少數質量較差的公辦學校 (M. Yu, 2016)。除學校質量外，這些學校中的同伴歧視和教師歧視嚴重影響着流動兒童的同化進程 (Lu & Zhou, 2013)。此外，即使學校分割水平相同，由於戶口類型差異，更熟悉城市教育系統的城市流動兒童更少受同伴歧視和教師歧視影響，從而實現向上同化；

而對城市教育系統和生活方式更為陌生的農村流動兒童，往往成為同伴歧視和教師歧視的受害者，從而出現向下同化的情況。由於城市地區執行義務教育「就近入學」政策，本地家庭又對高質量公辦教育機會出現激烈競爭，中國大陸針對流動兒童的戶口學校分割再次以新的形態出現，即在城市地區，大多數流動兒童實際上只能集中在少數質量較差的公立學校（D. Xu & Wu, 2022），因此本研究有以下假設：

假設 1：當前中國大陸義務教育初中階段存在明顯的戶口學校分割現象。

## 戶口學校分割與流動兒童福祉

兒童福祉是一個多維概念，涵蓋兒童發展成果的多個方面。福祉被界定為一種固有的積極個人特徵，包括學術、行為、身體和心理等（Pollard & Lee, 2003）。其中學術和行為福祉更是直接預測兒童成年後經濟收入、職業狀況和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因素（Robertson & Cooper, 2011）。在學術領域，學術福祉的衡量主要集中在學術表現和智力測試上，而行為福祉則通常以學生或兒童的課堂行為、在校表現和是否滿意學校來衡量（Pollard & Lee, 2003）。現有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將流動兒童福祉的劣勢歸因於輾轉於城鄉間的流動經歷或較為薄弱的家庭背景（Wu & Zhang, 2015），但部分研究者認為基於戶口的學校分割才是影響流動兒童福祉的主要原因（Y. Chen & Feng, 2019; Lu & Zhou, 2013; D. Xu & Wu, 2022）。

早期研究發現，與就讀於公辦學校的流動兒童相比，在打工子弟學校就讀的流動兒童不僅學術表現更差、孤獨感更強，而且表現出更多的負面心理和行為問題（Y. Chen & Feng, 2019; Lu & Zhou, 2013）。近期研究指出，戶口學校分割的另一衡量指標——學校流動兒童比例——同樣對流動兒童的學術福祉具有重要影響。Ma（2020）認為戶口學校分割是造成流動兒童與本地兒童學術表現差距的重要原因。D. Xu & Wu（2022）發現，戶口學校分割不僅對流動兒童的學習成績有負面影響，還進一步拉大了流動兒童與本地兒童之間的成績差距。戶口學校分割對流動兒童行為福祉的研究仍相對有限。參照西方移民研究中學校分割對少數族裔兒童行為福祉的負面作用結果（Elder et al., 2021; Goldsmith, 2011），本研究推論以下假設：

假設 2：學校流動兒童比例負面預測流動兒童的學術福祉和行為福祉。

## 戶口歧視的中介作用

儘管城市公立學校比打工子弟學校能提供更好的教育資源和教育機會，但並不意味流動兒童能和城市兒童擁有平等的待遇。與國際移民相比，流動兒童遇到的文化、語言和課程障礙相對較少，但城鄉差距觀念的持續，學校中基於戶口的歧視現象仍然

持續影響着流動兒童（Hill & Zhou, 2023）。研究發現，流動兒童在公立學校中常成為偏見的目標，被刻板地認為是野蠻、缺乏禮貌和低能力的（Lu & Zhou, 2013）。此外，流動兒童在學校中還時常被邊緣化，甚至被統一貼上「農村或農民的標籤」（Li & Placier, 2015; Liu & Laura, 2018）。在流動兒童比例較高的學校，來自同伴和教師的戶口歧視更為嚴重（Wang et al., 2015）。

已有研究表明，歧視經歷對少數族裔或易受傷害群體的學術和行為福祉具有負面影響（Carter et al., 2017; Straiton et al., 2019）。對流動兒童而言，同伴歧視不僅被發現與學術表現呈負相關關係（Hill & Zhou, 2023），還會負面影響流動兒童的社會行為表現（Song & Zhou, 2019）。西方研究指出，來自教師的歧視會導致移民兒童在課堂上表現不佳，表現出更多負面行為問題（Brown, 2015）。來自中國的證據表明，學校中的教師歧視不僅負面預測流動兒童的學術表現，還與行為表現呈顯著的負相關關係（Song & Zhou, 2019）。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3：學校流動兒童比例通過同伴歧視和教師歧視的增加，間接降低流動兒童的學術和行為福祉。

## 戶口類型的調節效應

戶口類型被視為影響流動兒童學術和行為福祉的重要因素（Y. Chen & Feng, 2013; Y. Jiang, 2016）。根據戶口類型，流動兒童可以分為農村流動兒童和城市流動兒童，前者出生在農村地區，後者出生在城市地區。兩類流動兒童在父母受教育背景、職業類型和家庭收入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其中，農村流動兒童的家庭社經地位遠低於城市流動兒童（W. Liang, Liu, et al., 2019; H. Xu & Xie, 2015）。兩類流動兒童在學術和行為福祉方面同樣存在顯著差異（Zhao et al., 2017）。與城市流動兒童相比，農村流動兒童在學術表現和認知發展方面處於明顯的劣勢（Kim et al., 2021; W. Liang, Liu, et al., 2019）。此外，還有研究指出，農村流動兒童還表現出更多問題行為，如吵架、打架、欺負同學、逃課逃學和抽煙喝酒等，因此行為福祉遠低於城市流動兒童（武瑋、李佳麗，2021）。

除戶口類型對流動兒童福祉的直接影響外，戶口類型還可以充當戶口學校分割與流動兒童福祉間關係的調節變量。一方面，更熟悉城市生活和城市學校教育系統的城市流動兒童擁有更多家庭資本，如補習機會和家庭內外的父母參與等（Cherng et al., 2022），因而更不容易受到戶口學校分割的影響。另一方面，家庭社經地位較低的農村流動兒童父母對城市教育系統較為陌生（Y. P. Chen & Liang, 2007），加之工作時間長和缺乏工作靈活性導致農村流動兒童父母很少參與到子女教育，亦很少有機會與社區中其他家長交流，在家庭與社區中無法完成社會閉合（social closure）（武瑋、

李佳麗，2021），戶口學校分割對農村流動兒童的影響可能被放大。換言之，不同戶口類型的流動兒童有出現分段同化的可能。綜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4：學校流動兒童比例對流動兒童學術和行為福祉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因戶口類型存在差異。

## 研究方法

### 資料來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來自中國教育追蹤調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該調查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資料中心設計和實施。CEPS 是迄今中國大陸最有影響力的教育追蹤調查專案之一，旨在揭示中國大陸家庭、學校、社區和宏觀社會結構對個人教育產出的影響。CEPS 以 2013–2014 新學年為基線，以初中一年級（7 年級）和三年級（9 年級）兩個同期群體為調查起點。在 2013–2014 的基線調查中有 112 所學校、438 個班級進入樣本，總樣本包括近 2 萬名學生。2014–2015 年的追蹤數據對基線調查中初中一年級進行追蹤調查，即追蹤數據中的初中二年級（8 年級）。

CEPS 採用多階段的概率與規模等比例抽樣方法。第一階段以縣（區）為初級抽樣單位，根據 2010 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將中國大陸境內 31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不含港澳台）內 2,870 個有常住人口的縣（區）級行政單位分成 3 個抽樣框，抽取 28 個縣（區）。第二階段以學校為二級抽樣單位，採用概率與等比例的抽樣方法從每個入樣縣（區）抽取 4 所學校。第三階段以班級為三級抽樣單位，在入樣學校被調查的年級中抽取班級。在第四階段，完成第三階段的班級抽樣後，入樣班級的所有學生全部納入最終調查樣本。由於本研究關注的是流動兒童流入城市地區後面臨的戶口學校分割影響，因而刪除了樣本中的農村樣本 and 基線調查中未公開追蹤數據的 9 年級樣本。最終，進入分析樣本為參與兩次 CEPS 調查的流動兒童共 1,226 人。表一為樣本的基本統計量：女生佔樣本 48.69%（ $n = 597$ ）；流動兒童平均年齡為 13.56 歲（ $SD = 0.69$ ）；農村流動兒童 595 名（48.53%），城市流動兒童 631 名（51.47%）。

### 變數測量

#### 學術福祉

與已有研究相符（D. Xu & Wu, 2022; H. Xu & Xie, 2015），本研究使用第二期調查中標準化認知能力測試得分衡量學業福祉。CEPS 中的認知測試主要從語言、圖形

與空間、計算與邏輯三個維度上對初中生進行 15 分鐘的課堂認知能力測試，其中語言包括詞組類比、語言文字推理，圖形與空間包括圖形規律分析、摺紙類題目和幾何圖形應用，計算與邏輯則包括數學應用、自定義運算規則、數列應用、抽象規律分析、概率和數值大小逆向思維。得分愈高，表明學業福祉愈高。標準化認知測試分數均值为 0，標準差為 1，因而可在不同年級、學校和區域進行對比。

表一：樣本基本統計量

變數	類別	次數／均值	百分比／標準差
性別	女	597	48.69%
	男	629	51.31%
年齡	區間 (12-16)	13.56	0.69
戶口類型	農村流動兒童	595	48.53%
	城市流動兒童	631	51.47%
父母最高教育年限	區間 (0-19)	10.73	3.16
家庭經濟收入	區間 (1-5)	2.91	0.52
家庭結構	與父母不同住	200	16.31%
	與父母同住	1,026	83.69%
學校品質	區間 (1-5)	3.84	0.92
學校地區	邊緣城區	512	41.76%
	中心城區	714	58.24%
學校地域	中西部	440	35.89%
	東部	786	64.11%

## 行為福祉

參照現有研究 (S. Jiang & Ngai, 2020; Y. Yu et al., 2021)，本研究使用第二期調查中的行為表現衡量行為福祉。CEPS 中的行為表現來自 CEPS 學生問卷中對「過去一年中發生以下行為」十個問題的回答，包括「罵人」、「吵架」、「打架」、「欺負弱小同學」、「脾氣暴躁」、「注意力不集中」、「逃課逃學」、「抄襲與作弊」、「抽煙喝酒」和「上網吧遊戲廳」。回答從「1 = 完全不同意」到「4 = 完全同意」。本研究首先對上述賦值進行逆向反轉，再使用主成分分析評估行為福祉水平，得分愈高表示行為福祉愈高，量表信度為 .78。

## 戶口學校分割

本研究採用兩種方法衡量第一期數據的戶口學校分割，分別是不均衡指數和接觸指數 (Massey & Denton, 1988)，前者是「差異指數」(dissimilarity index, 亦稱鄧肯指數, 簡稱 *D*)，後者為學校流動兒童比例。在本研究中，差異指數衡量的是流動

兒童和本地兒童在不同學校的不平均分布程度。 $D$  取值處於 0 和 1 之間，取值反映了有多大比例的流動兒童或本地兒童需要轉校，才能達到學校間的整合。例如  $D$  取值為 0.4，則表明有 40% 的學生需要轉學才能消除學校戶口分割 (Duncan & Duncan, 1955)。 $D$  指數的計算公式是：

$$D = \frac{1}{2} \sum_{i=1}^n \left[ \frac{h_i}{h} - \frac{l_i}{l} \right]$$

其中  $n$  是學校數量， $h_i$  是第  $i$  所學校中流動兒童學生人數， $h$  是所有學校流動兒童人數， $l_i$  是第  $i$  所學校本地學生人數， $l$  是所有學校本地學生人數。學校流動兒童比例衡量學校流動兒童構成，即剔除當前個體後，學校內流動兒童佔學校總人數的比例，取值愈高表示學校中流動兒童比例愈高。

### 同伴歧視

本研究通過 CEPS 第一期學生問卷中的四個問題來衡量同伴歧視 (Kim et al., 2021)：「你認為本地同學會對來自其他地區的學生做以下事情嗎？(1) 提出投訴或冒犯性言論；(2) 不在一起玩；(3) 不交朋友；(4) 不討論與作業有關的問題」，學生回答是或否，選擇「是」表示有歧視，「否」則表示不具歧視。同伴歧視指數是通過四個項目的因子得分來衡量的，得分愈高表示同伴歧視程度愈高，量表信度為 .78。

### 教師歧視

本研究使用第一期學生問卷和家長問卷中的四個問題衡量教師歧視 (S. Jiang & Dong, 2020)。學生問卷包括「你認為老師更喜歡哪種學生？」和「當非本地縣／區的學生與本地縣／區的學生發生衝突時，您認為老師會偏袒誰？」。回答包括：(1) 來自當地縣／區的學生；(2) 來自非本地縣／區的學生；(3) 沒有區別。如果家長選擇「來自當地縣／區的學生」，則視為歧視態度。家長問卷包括「你認為學校教師對非本地縣／區的學生有偏見嗎？」和「你認為學校教師對非本地縣／區學生的家長有偏見嗎？」。答案從「1 = 完全沒有偏見」到「4 = 很有偏見」。如果家長選擇了「完全沒有偏見」以外的選項，歧視態度將得到確認。教師歧視指數是通過四個項目的因子分數來衡量的，分數愈高表示教師歧視程度愈高，量表信度為 .86。

## 戶口類型

本研究先將學生就讀學校所在地與戶籍登記地不一致的學生界定為流動兒童（Y. Chen & Feng, 2013; Y. Jiang, 2016）。此外，CEPS 中還提供了學生戶口類型的具體信息，即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這使得我們能進一步區分農村流動兒童和城市流動兒童，前者為持有農村戶口的流動兒童，後者為持有城市戶口的流動兒童。

## 控制變量

參照相關研究（吳愈曉、黃超，2016；D. Xu & Wu, 2022），本研究的控制變量還包括個體特徵、家庭特徵和學校特徵。學生個體變數包括性別（0 = 女生，1 = 男生）和年齡；家庭特徵包括父母最高教育年限、家庭經濟收入（從「1 = 非常貧窮」到「5 = 非常富裕」）和家庭結構（0 = 不與父母同住，1 = 與父母同住）；學校特徵包括學校排名（從「1 = 最差」到「5 = 最好」）、學校地區（0 = 邊緣城區，1 = 中心城區）和學校地域（0 = 中西部，1 = 東部）。

## 數據分析

首先，本研究對主要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包括連續變量平均值和標準差，類別變量的頻率和百分比，然後對主要變量進行相關分析。其次，使用學校固定效應模型確定戶口學校分割對流動兒童學術和行為福祉的影響效應。最後，為檢驗戶口歧視的中介作用和戶口類型的調節作用，本研究將中介效應分析和調節效應分析納入一個綜合分析框架。為了分析有中介的調節假設，我們使用 SPSS 中的 PROCESS 宏分析（Hayes, 2013），該方法基於迴歸方法，專門用於評估包括中介變量和調節變量的複雜模型。本研究中，我們使用 95% 置信區間的 Bootstrap 方法，選擇 5,000 次自抽樣計算間接效應。

# 研究結果

## 初始分析

表二顯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結果。學校流動兒童比例與流動兒童的學術福祉和行為福祉呈顯著負相關，與同伴歧視和教師歧視呈顯著正相關。此外，同伴歧視和教師歧視不僅與流動兒童學術福祉呈顯著負相關，還與流動兒童的行為福祉呈顯著的負相關。

表二：各核心變數描述性分析和相關分析

	1	2	3	4	5
1. 學校流動兒童比例	1				
2. 同伴歧視	.05***	1			
3. 教師歧視	.09***	.05**	1		
4. 學術福祉	-.29***	-.20***	-.10***	1	
5. 行為福祉	-.14***	-.09***	-.08***	.27***	1
平均值	.37	-.05	.01	.34	-.05
標準差	.23	.81	.91	.83	.99

\*\*  $p < .01$ , \*\*\*  $p < .001$

## 戶口學校分割的現狀描述

為驗假設 1，本研究通過計算差異之處，量化中國大陸義務教育初中階段的戶口學校分割程度。在研究中，分割指數  $D$  測量的是本地兒童和流動兒童在不同學校的不均衡分布程度，表三顯示出分割指數  $D$  的計算結果。

表三：戶口學校分割的統計分布

	學校數量	流動兒童數量	學校流動兒童比例	$D$
<b>整體</b>				
中國大陸	68	1,226	0.37	0.48
<b>分地區</b>				
中心城區	41	714	0.34	0.36
邊緣城區	27	512	0.36	0.32
<b>分地域</b>				
東部	36	786	0.39	0.52
中西部	32	440	0.33	0.38

表三結果顯示，在中國大陸城市整體樣本中，分割指數  $D$  等於 0.48，即要消除戶口學校分割，48% 的本地或流動兒童需要轉學，這表明中國大陸地區義務教育初中階段存在明顯的戶口學校分割現象，上述結果與假設 1 一致。同時，戶口學校分割在不同地區和地域同樣存在差異，中心城區的戶口學校分割程度較高 ( $D = 0.36$ )，邊緣城區的戶口學校分割程度較低 ( $D = 0.32$ )；東部戶口學校分割程度較高 ( $D = 0.52$ )，中西部戶口學校分割程度較低 ( $D = 0.38$ )。

## 戶口學校分割的影響效應

為檢驗假設 2，本研究使用多元迴歸方法分析學校流動兒童比例對流動兒童學術福祉和行為福祉的影響效應。表四顯示，在個體、家庭、學校特徵一致的情況下，學校流動兒童比例對流動兒童學術福祉具有直接的負面影響 ( $\beta = -.87, p < .001$ )，對流動兒童行為福祉同樣具有直接的負面影響 ( $\beta = -.82, p < .001$ )。總之，學校流動兒童比例對流動兒童學術福祉和行為福祉均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故假設 2 成立。

表四：戶口學校分割對流動兒童福祉的影響效應分析

	學術福祉	行為福祉
	模型 1	模型 2
<b>控制變數</b>		
性別	-.10**	-.28***
年齡	.16***	.09**
父母最高教育年限	.04***	.01
家庭經濟收入	.12**	.11**
家庭結構	.13**	.30***
學校排名	.06*	.06
學校地區	.17*	.08
學校地域	.11***	.05
<b>自變量</b>		
學校流動兒童比例	-.87***	-.82***
學校固定效應	✓	✓
$R^2$	.18	.07
$F$	25.99***	8.19***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戶口歧視的中介效應分析

為檢驗假設 3，本研究使用中介效應分析方法探討同伴歧視和教師歧視在戶口學校分割與流動兒童福祉（學術福祉和行為福祉）之間是否有中介關係。表五中模型 1 和模型 2 結果顯示，學校流動兒童比例增加了同伴歧視水平 ( $\beta = .43, p < .01$ ) 和教師歧視 ( $\beta = .24, p < .01$ )。這意味着在學校流動兒童比例較高的學校中，同伴歧視和教師歧視的水平亦愈高。

表五：流動兒童福祉的中介和調節效應分析

	同伴歧視	教師歧視	學術福祉	行為福祉	學術福祉	行為福祉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b>控制變數</b>						
性別	.05	.02	-.19***	-.27***	-.09***	-.26***
年齡	.03	.11**	.15***	.08*	.15***	.08*
父母最高教育年限	.02*	.02**	.04***	.01	.04***	.01
家庭經濟收入	.04	.03	.11**	.12**	.12**	.12**
家庭結構	-.13*	.09	.07	.31***	.07	.31***
學校排名	.04	.09**	.06***	.06	.07***	.06
學校地區	-.05	.05	.17***	.07	.17***	.07
學校地域	-.02	.09	.11**	.05	.10**	.05
<b>自變量</b>						
學校流動兒童比例	.43**	.24**	-.61***	-.43***	-.34**	-.27***
同伴歧視			-.39***	-.13	-.25***	-.11
教師歧視			-.37**	-.07	-.06**	-.04
戶口類型			-.02	.03	.15*	.02
<b>調節變數</b>						
學校流動兒童 比例 × 戶口類型					.42**	.13
同伴歧視 × 戶口類型					.13**	.02
教師歧視 × 戶口類型					.02	-.11
學校固定效應	✓	✓	✓	✓	✓	✓
$R^2$	.01	.03	.21	.08	.22	.08
$F$	1.14***	3.40***	23.71***	7.04***	20.09***	5.20***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表五中模型 3 結果顯示，學校流動兒童比例顯著負面預測流動兒童學術福祉 ( $\beta = -.61, p < .001$ )，但較表四中係數有大幅下降。同時，同伴歧視與流動兒童學術福祉呈顯著負相關 ( $\beta = -.39, p < .001$ )，教師歧視與流動兒童學術福祉同樣呈顯著負相關 ( $\beta = -.37, p < .01$ )。Bootstrap 結果表明，學校流動兒童比例通過同伴歧視的間接影響是顯著的 ( $\beta = -.04, SE = .02, 95\% CI = [-.08, -.04]$ )，通過教師歧視的間接影響同樣顯著 ( $\beta = -.06, SE = .03, 95\% CI = [-.12, -.02]$ )。這表明同伴歧視和教師歧視在一定程度上中介了學校流動兒童比例與學術福祉間的關係。

表 5 中模型 4 結果顯示，學校流動兒童比例顯著負面影響流動兒童行為福祉 ( $\beta = -.43, p < .001$ )，係數較表四同樣有較大幅度下降。此外，同伴歧視和教師歧視均沒有顯著影響流動兒童的行為福祉。Bootstrap 結果顯示，學校流動兒童比例通過同伴歧視

( $\beta = -.01, SE = .01, 95\% CI = [-.02, .02]$ ) 和教師歧視 ( $\beta = -.03, SE = .02, 95\% CI = [-.07, .07]$ ) 對行為福祉的間接影響均不顯著。這意味着同伴歧視和教師歧視均沒有在學校流動兒童比例與行為福祉之間有中介關係。

因此，來自同伴和教師的戶口歧視在學校流動兒童比例與流動兒童福祉間的中介效應更多表現在學術福祉方面，而非行為福祉。此外，同伴歧視在一定程度上對學校流動兒童比例與流動兒童學術福祉間起到中介作用。結合表四可知，直接效應佔總效應的 70.11% ( $-.61 \div -.87$ )，同伴歧視和教師歧視的間接效應分別佔總效應的 19.28% ( $-.39 \times .43 \div -.87$ ) 和 10.21% ( $-.37 \times .24 \div -.87$ )，直接效應佔主導，故假設 3 得到部分驗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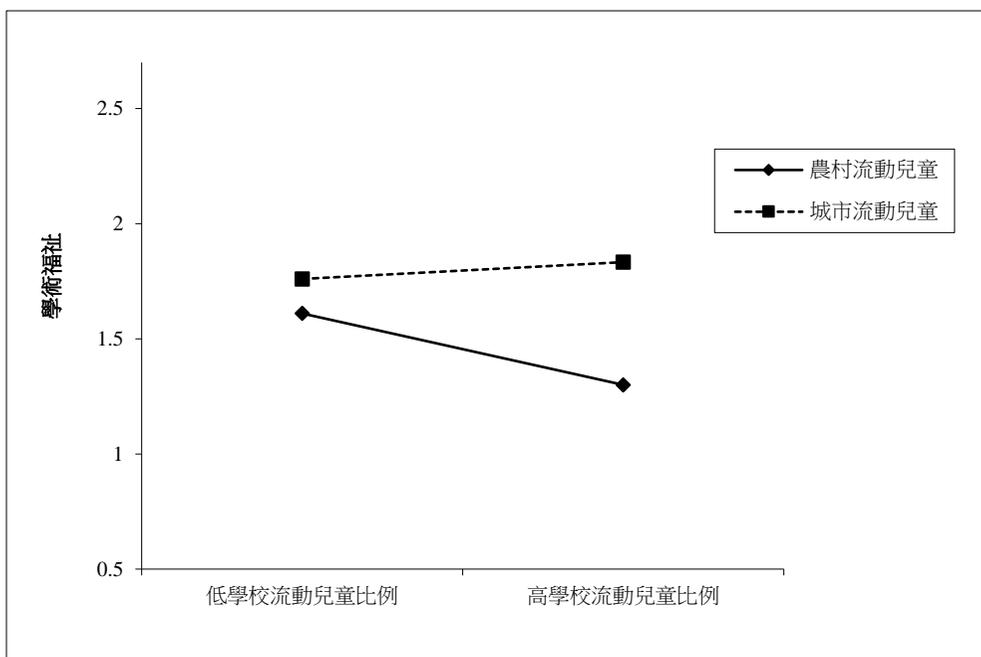
### 戶口類型的調節效應分析

在假設 4 中，我們假設戶口類型會調節學校流動兒童比例與流動兒童福祉間的直接關係。表五模型 5 中學校流動兒童比例與戶口類型的交互項對流動兒童的學術福祉有顯著正向影響 ( $\beta = .42, p < .01$ )，模型 6 中學校流動兒童比例與戶口類型的交互項並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 ( $\beta = .13, p > .05$ )，表明學校流動兒童比例與學術福祉間的關係受到戶口類型的調節，但戶口類型的調節作用並未在行為福祉中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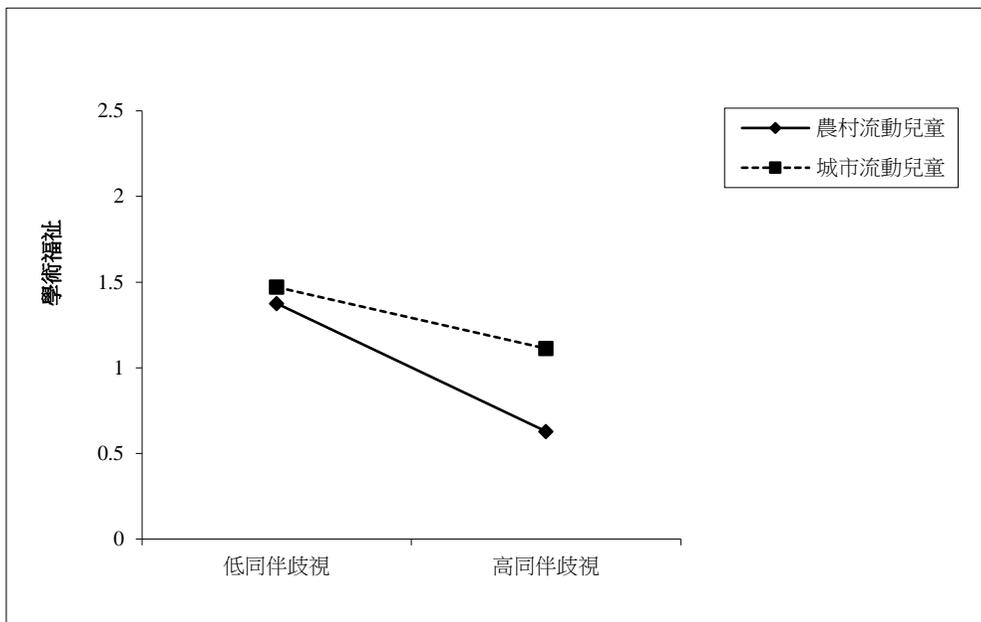
為便於描述，我們繪製了農村流動兒童和城市流動兒童在不同學校流動兒童比例時的學術福祉（圖一）。斜率檢驗結果表明，學校流動兒童比例與農村流動兒童的學術福祉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 ( $\beta = -.34, p < .01$ )；對城市流動兒童而言，學校流動兒童比例與學術福祉間呈正相關，且係數絕對值高於農村流動兒童 ( $\beta = .80, p < .001$ )。這表明，與城市流動兒童相比，農村流動兒童受學校流動兒童比例的負面影響更大。Bootstrap 結果進一步表明，學校流動兒童比例與學術福祉之間間接關係通過同伴歧視而被戶口類型所調節。對農村流動兒童而言，學校流動兒童比例與學術福祉之間存在較強的間接關係 ( $\beta = -.06, SE = .01, 95\% CI = [-.12, -.04]$ )。而對城市流動兒童而言，學校流動兒童比例與學術福祉間的間接關係相對較弱 ( $\beta = -.04, SE = .01, 95\% CI = [-.08, -.01]$ )。

同伴歧視對學術福祉的影響亦受到戶口類型影響 ( $\beta = .13, p < .01$ )。我們分別對農村流動兒童和城市流動兒童繪製了同伴歧視與學術福祉的關係圖（圖二）。如圖二所示，農村流動兒童受同伴歧視的負面影響更大 ( $\beta = -.25, p < .001$ )。與之對應，同伴歧視同樣負向影響城市流動兒童 ( $\beta = -.12, p < .001$ )，但斜率高於農村流動兒童。考慮到戶口類型的調節作用僅在學術福祉中出現，而非行為福祉，我們僅在圖三上繪製了對學術福祉存在顯著影響的路徑圖。由圖三可見，學校流動兒童比例對流動兒童學術福祉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因戶口類型存在差異，假設 4 得到部分驗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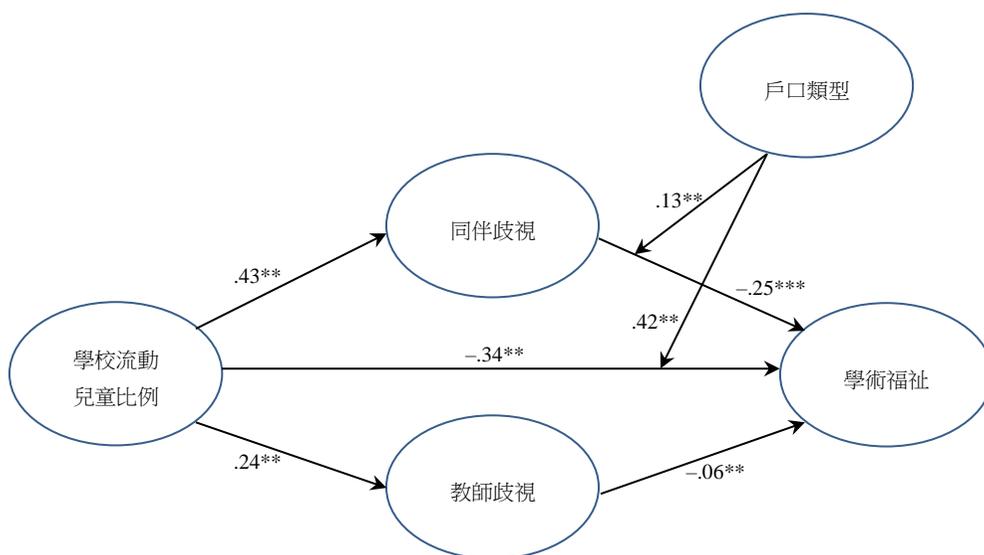
圖一：戶口類型對學校流動兒童比例影響學術福祉的調節效果



圖二：戶口類型對同伴歧視影響學術福祉的調節效果



圖三：學術福祉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



\*\*  $p < .01$ , \*\*\*  $p < .001$

## 結論與建議

### 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國大陸義務教育初中階段戶口學校分割與流動兒童福祉之間的關係，同時亦在一個綜合分析模型中考察了教師歧視和同伴歧視的中介機制和戶口類型的調節機制。研究結果總體上支持研究假設，證明了中國大陸義務教育階段存在明顯的戶口學校分割，戶口學校分割與流動兒童福祉之間存在顯著的關係，並驗證了戶口歧視的中介作用和戶口類型的調節作用。本研究驗證了假設 1，表明中國大陸城市初中階段存在程度較高的戶口學校分割現象。根據計算，如果達到本地兒童和流動兒童間完全的學校整合，大約有 48% 的本地或流動兒童需要轉換學校。總體而言，這是一個比較高的學校分割水平（吳愈曉、黃超，2016）。此外，研究還發現戶口學校分割存在明顯的地區和區域差異。東部地區分割水平高於中西部地區，城市邊緣城區分割水平高於中心地區。這可能是因為流動兒童及其父母大多集中在東部地區和中心城區，考慮到中國大陸地區義務教育階段的「就近入學」政策，戶口學校分割在流動兒童較為集中的東部地區和中心城區更為系統和頻繁地發生。

本研究驗證了假設 2，即戶口學校分割的另一衡量指標——學校流動兒童比例——顯著負面預測流動兒童的學術福祉和行為福祉。這一發現支持已有西方移民研究，即學校分割對少數族裔兒童的學術福祉、學校歸屬感和學術幸福感等具有負面

影響 (Reardon & Owens, 2014)。幾項中國研究發現，學校流動兒童比例與流動兒童的學術福祉有負相關 (Ma, 2020; D. Xu & Wu, 2022)。此外，本研究的結果與先前西方移民研究相似，即學校分割與少數族裔兒童的行為福祉呈負相關 (Freeman & Steidl, 2016)。

此外，本研究部分驗證了假設 3，即戶口歧視在學校流動兒童比例和流動兒童福祉間起中介作用。這一發現支持了前人文獻，即學校少數族裔比例對同伴歧視和教師歧視具有正面影響 (Kim et al., 2021)。本研究結果還與已有研究一致，這些研究表明較高的同伴歧視和教師歧視水平與流動兒童的學術福祉呈負相關 (Cao et al., 2022; Song & Zhou, 2019)。相反，本研究沒有發現同伴歧視和教師歧視與流動兒童行為福祉間的顯著關係。這可能是因為來自學校中同伴和教師的歧視行為，在短期仍不足以對流動兒童的行為發展造成影響。這一發現亦表明，需要有更長時間的追蹤數據探討不同歧視行為與流動兒童行為福祉間的關係。

最後，本研究同樣部分驗證了假設 4，即戶口類型會調節學校流動兒童比例與流動兒童福祉間的關係，以及戶口歧視與流動兒童福祉間的關係。換言之，在農村流動兒童而非城市流動兒童中，不僅存在學校流動兒童比例與學術福祉間的直接聯繫，而且存在同伴歧視與學術福祉間的聯繫。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戶口學校分割對本地和流動兒童間學術發展不平等的影響 (Ma, 2020; D. Xu & Wu, 2022)。

在上述的研究基礎上，本研究將分析目標直接限定在戶口學校分割對流動兒童學術和行為福祉的影響上。此外，本研究還進一步探究了戶口歧視在戶口學校分割和流動兒童福祉間的中介作用，以及戶口類型在戶口學校分割與學術福祉間的調節作用。因此，本研究除擴展戶口學校分割的影響效應外，還揭示了戶口學校分割產生影響的作用機制，以及對不同戶口類型流動兒童影響的異質性特徵，以期進一步豐富中國大陸背景下流動兒童福祉的經驗證據。

## 貢獻與啟示

從理論上看，本研究所提出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為今後研究分段同化理論、學校分割與流動兒童福祉間的關係提供了可能的理論框架。已有研究主要探討種族學校分割與少數族裔兒童福祉間的關係 (Guryan, 2004; Rivkin & Welch, 2006)。本研究擴展了現有研究，指出中國大陸戶口學校分割亦可視作一種普遍而系統的學校分割。同時，本研究還拓展了分段同化理論。首先，本研究將學校分割納入分段同化的統一分析框架；其次，還探討了同伴和教師歧視在學校分割影響流動兒童福祉中的中介作用；最後，並進一步提出由戶口類型帶來的異質性同樣能成為影響流動兒童同化方向的重要特徵。這都為解決有關影響分段同化作用機制中的風險因素和調節因素理論爭論提供了新的視角。

在實踐層面，本研究的一個重要實踐意義是，雖然目前大陸地區流入地政府已經開始為流動兒童提供公辦學校的入學機會，但流入地政府和教育部門仍應及時制訂教育政策，防止新一輪的戶口學校分割，避免大量流動兒童集中到少數公立學校，促進中國大陸 7,102 萬流動兒童學術和行為福祉的整體提升。例如，美國最高法院在 1968 年的格林訴新肯特縣校董會案（*Green v. County School Board of New Kent County*）中要求學區採取更有效的計劃，實現黑人與白人學生間的融合。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數百個學區收到法院命令要求取消種族分割（Logan & Oakley, 2004），學校分割水平隨即大幅下降，區域內的分割指數從 1968 年的 0.63 下降到 1972 年的 0.37，黑人與白人的接觸指數亦由 0.22 上升至 0.33（Coleman et al., 1975）。

此外，本研究發現了戶口歧視在戶口學校分割與流動兒童福祉間關係的不同作用。本研究的另一個實踐意義是在制訂提升流動兒童整體福祉的政策時，應該重視同伴歧視的重要影響，尤其是對於農村流動兒童而言。雖然現有政策非常重視流動兒童的教育發展，但仍然是解決「入口端」公辦學校的入學機會，並未考慮到由此帶來的新一輪戶口學校分割的可能。同時，現有政策忽視了「過程段」中流動兒童在學校裏面臨來自同伴和教師的戶口歧視風險，亦未對流動兒童群體進行區分（W. Liang, Liu, et al., 2019），因而難以保證政策的效應和精準度。

最後，本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大陸義務教育階段基於戶口的學校分割的嚴重性，這意味着政策制訂者應持續推進戶口制度改革，削弱因戶口學校分割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亦應努力減少流動兒童在流入地可能面臨的偏見和不平等，為更為弱勢的農村流動兒童家庭提供額外的補償性公共服務，例如提供免費課後輔導、父母參與指導和社區托管等服務。最後，還要推動流動兒童社會同化項目，消除校內同伴和教師的歧視行為，以期降低現有戶口歧視對流動兒童福祉的負面影響。

##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對學校分割和流動兒童福祉相關文獻皆有貢獻，但仍有一些限制，值得未來研究者進一步探討，彌補本研究的不足。首先，本研究使用截面數據，實際上仍屬於橫截面研究，這使得我們無法得出戶口學校分割對流動兒童福祉影響的因果解釋。相應的調節效應和中介效應分析亦同樣基於截面數據。建議未來研究可以使用不同時間點的追蹤研究數據，從而提供更加具備說服力的因果推斷證據。

其次，本研究的主要變量測量雖然顯示出較高的信度，但由於 CEPS 中可使用的信息相對有限，在本研究中仍然使用了少部分未經驗證的變量測量方式。因此，本研究的結果可能存在一定的測量偏差，建議未來研究者對研究結果的解讀更加慎重，尤其是更多採用自編問卷獲取數據信息。

最後，本研究僅關注戶口學校分割對流動兒童福祉的影響。隨着流動兒童規模的持續上升，加之現行義務教育階段的「就近入學」政策和城市居住分割程度逐漸加深（鄭磊、王思檬，2014），預計未來會體現出更多社經地位學校分割特點，未來研究可以關注社經地位學校分割對流動兒童福祉的影響。當然，儘管存在這些局限，本研究仍有助於加深對中國大陸義務教育階段戶口學校分割與流動兒童福祉間關係的理解。

## 註釋

1. 本研究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 2023 年度國家一般課題「新時代基於教育結果的流動兒童義務教育補償政策及實現路徑研究」（課題批准號：BFA230079）的階段性成果。

## 參考文獻

- 吳愈曉、黃超（2016）。〈基礎教育中的學校階層分割與學生教育期望〉。《中國社會科學》，第 4 期，頁 111–134。
- 武瑋、李佳麗（2021）。〈父母參與、未來信心與青少年發展——本地和流動青少年的對比分析〉。《教育與經濟》，第 7 期，頁 66–37。
- 鄭磊、王思檬（2014）。〈學校選擇、教育服務資本化與居住區分割——對“就近入學”政策的一種反思〉。《教育與經濟》，第 6 期，頁 25–32。
- Allen, R., & Vignoles, A. (2007). What should an index of school segregation measure?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33(5), 643–668. <https://doi.org/10.1080/03054980701366306>
- Blau, P. M. (1977).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A primitiv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Free Press.
- Brown, C. S. (2015). *The education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impact of discrimination on the immigrant child*.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FCD-Brown-FINALWEB.pdf>
- Cao, J., Xie, M., & Lin, D. (2022). Trajectories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mong Chinese rural-to-urban migrant early adolescents: Predictors and outcome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51(5), 871–887.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21-01546-5>
- Carter, R. T., Lau, M. Y., Johnson, V., & Kirkinis, K. (2017).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health outcomes among racial/ethnic minorities: A meta-analytic review.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45(4), 232–259. <https://doi.org/10.1002/jmcd.12076>
- Chen, Y. [Yuanyuan], & Feng, S. (2013). Access to public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6, 75–88. <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13.04.007>

- Chen, Y. [Yuanyuan], & Feng, S. (2019). The educ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s urban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Evidence from Shanghai. *China Economic Review*, 54, 390–402. <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19.02.002>
- Chen, Y. P. [Yiu Por], & Liang, Z. (2007).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migrant children: The forgotten story of China's urbanization. In E. Hannum & A. Park (Eds.), *Education and reform in China* (pp. 117–132). Routledge.
- Cheng, H. Y. S., Godfrey, E., & Rarick, J. (2022). Parenting in a new world: Migration, social class, and parenting, and links to academic outcomes i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55(4), 458–481. <https://doi.org/10.1080/21620555.2022.2078696>
- Clotfelter, C. T. (2001). Are Whites still fleeing? Racial patterns and enrollment shifts in urban public schools, 1987–1996.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20(2), 199–221. <https://doi.org/10.1002/pam.2022>
- Coleman, J. S., Kelly, S. D., & Moore, J. A. (1975). *Trends in school segregation, 1968–73*. Urban Institute.
- Duncan, O. D., & Duncan, B. (1955). A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of segregation index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2), 210–217. <https://doi.org/10.2307/2088328>
- Elder, T. E., Figlio, D. N., Imberman, S. A., & Persico, C. L. (2021). School segregation and racial gaps in special education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9(S1), S151–S197. <https://doi.org/10.1086/711421>
- Farley, R., & Alba, R. (2002).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6(3), 669–701. <https://doi.org/10.1111/j.1747-7379.2002.tb00100.x>
- Foner, N., & Alba, R. (2008). Immigrant religion in the U.S. and Western Europe: Bridge or barrier to inclu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2(2), 360–392. <https://doi.org/10.1111/j.1747-7379.2008.00128>
- Freeman, K. J., & Steidl, C. R. (2016). Distribution, composition and exclusion: How school segregation impacts racist disciplinary patterns. *Race and Social Problems*, 8(2), 171–185. <https://doi.org/10.1007/s12552-016-9174-9>
- Goldsmith, P. R. (2011). Coleman revisited: School segregation, peers, and frog ponds.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48(3), 508–535. <https://doi.org/10.3102/0002831210392019>
- Gu, X., & Yeung, W. J. J. (2020). Hopes and hurdles: Rural migrant children's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52(2), 199–237. <https://doi.org/10.1080/21620555.2019.1680970>
- Guryan, J. (2004). Desegregation and black dropout r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4), 919–943. <https://doi.org/10.1257/0002828042002679>
- Hayes, A. F. (2013).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Guilford Press.
- Hill, A. J., & Zhou, W. (2023). Peer discrimination in the classroom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8(4), 1178–1206. <https://doi.org/10.3368/jhr.59.2.0919-1046OR3>

- Jiang, S., & Dong, L. (2020). The effects of teacher discrimination on depression among migrant adolescents: Mediated by school engagement and moderated by poverty statu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75, 260–267. <https://doi.org/10.1016/j.jad.2020.07.029>
- Jiang, S., & Ngai, S. S. Y. (2020). Social exclusion and multi-domain well-being in Chinese migrant children: Exploring the psychosocial mechanisms of need satisfaction and need frustration.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16, Article 105182. <https://doi.org/10.1016/j.chilyouth.2020.105182>
- Jiang, Y. (2016). Do migrant children replicate their parents' social economic statu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Dialogue*, 1(2), 140–151. <https://doi.org/10.1177/2397200917689907>
- Kim, J., Tong, Y., & Sun, S. B. (2021). The effects of peer parental education on student achievement in urban China: The disparities between migrants and locals.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58(4), 675–709. <https://doi.org/10.3102/0002831221989650>
- Li, N., & Placier, P. (2015). Migrant and non-migrant families in Chengdu, China: Segregated lives, segregated schools. *Social Sciences*, 4(2), 339–360. <https://doi.org/10.3390/socsci4020339>
- Liang, W., Liu, S., & Ye, X. (2019). Internal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ese classrooms: Do they influence students' achievem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98, 106–122. <https://doi.org/10.1016/j.ijer.2019.08.013>
- Liang, Z., Yue, Z., Li, Y., Li, Q., & Zhou, A. (2020). Choices or constraints: Educ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 urba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9(4), 671–690. <https://doi.org/10.1007/s11113-019-09564-9>
- Liu, S., Liu, F., & Yu, Y. (2017). Educational equality in China: Analysing educational policies for migrant children in Beijing. *Educational Studies*, 43(2), 210–230. <https://doi.org/10.1080/03055698.2016.1248904>
- Liu, T., & Laura, R. S. (2018). From education segregation to inclusion: The policy ramifications on Chinese internal migrant children.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16(3), 237–250. <https://doi.org/10.1177/1478210318760439>
- Logan, J. R., & Oakley, D. (2004). *The continuing legacy of the Brown decision: Court action and school segregation, 1960–2000*. <https://s4.ad.brown.edu/Projects/usschools/reports/report2.pdf>
- Lu, Y., & Zhou, H. (2013).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loneliness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School segregation and segmented assimila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57(1), 85–116. <https://doi.org/10.1086/667790>
- Ma, G. (2020). Migrant status, school segregation, and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urba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52(3), 319–336. <https://doi.org/10.1080/21620555.2019.1680280>
- Massey, D. S., & Denton, N. A. (1988). The dimensions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Social Forces*, 67(2), 281–315. <https://doi.org/10.1093/sf/67.2.281>

-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21). *Tabulation on the 2021 population censu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ook I, book II, book III): NS report*. Author.
- Pollard, E. L., & Lee, P. D. (2003). Child well-being: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61*(1), 59–78. <https://doi.org/10.1023/A:1021284215801>
- Portes, A., & Zhou, M. (1993).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30*(1), 74–96. <https://doi.org/10.1177/0002716293530001006>
- Reardon, S. F., & Owens, A. (2014). 60 years after Brown: Trends and consequences of school segreg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0*, 199–218.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soc-071913-043152>
- Rivkin, S., & Welch, F. (2006). Has school desegregation improved academic and economic outcomes for Blacks?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2*, 1019–1049. [https://doi.org/10.1016/S1574-0692\(06\)02017-4](https://doi.org/10.1016/S1574-0692(06)02017-4)
- Robertson, I., & Cooper, C. (2011). *Well-being: Productivity and happiness at work*. Palgrave Macmillan.
- Song, Y., & Zhou, G. (2019).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household education expenditures: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55*, 85–98. <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19.03.002>
- Straiton, M. L., Aambø, A. K., & Johansen, R. (2019).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immigrants in Norway: The role of moderating factors. *BMC Public Health, 19*, Article 325. <https://doi.org/10.1186/s12889-019-6649-9>
- Vasque Heilig, J., & Holme, J. J. (2013). Nearly 50 years post-Jim Crow: Persisting and expansive school segregation for African American, Latina/o, and ELL students in Texas. *Education and Urban Society, 45*(5), 609–632. <https://doi.org/10.1177/0013124513486289>
- Wang, H., Guo, F., & Cheng, Z. (2015). Discrimination in migrant workers' welfare entitlements and benefits in urban labour market: Findings from a four-city study in China.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1*(2), 124–139. <https://doi.org/10.1002/psp.1810>
- Wells, A. S., & Crain, R. L. (1994). Perpetuation theory and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school desegregation.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4*(4), 531–555. <https://doi.org/10.3102/00346543064004531>
- Westin, C. (2003). Young people of migrant origin in Swede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7*(4), 987–1010. <https://doi.org/10.1111/j.1747-7379.2003.tb00167.x>
- Wu, X., & Zhang, Z. (2015).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children's school enrollments in China, 1990–2005.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53*, 177–190. <https://doi.org/10.1016/j.ssresearch.2015.05.007>
- Xu, D., & Wu, X. (2022). Separate and unequal: *Hukou*, school segregation,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54*(5), 433–457. <https://doi.org/10.1080/21620555.2021.2019007>

- Xu, H., & Xie, Y. (2015). The causal effects of rural-to-urban migration on children's well-being in China.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31*(4), 502–519. <https://doi.org/10.1093/esr/jcv009>
- Yu, M. (2016). *The politics, practices, and possibilities of migrant children school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algrave Macmillan.
- Yu, Y., Zhao, Y., Li, D., Zhang, J., & Li, J. (20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g fiv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well-being of Chinese resident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Article 613659.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0.613659>
- Zhao, G., Ye, J., Li, Z., & Xue, S. (2017). How and why do Chinese urban students outperform their rural counterparts? *China Economic Review*, *45*, 103–123. <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17.06.006>

**The Effects of *Hukou*-based School Segmentation on Well-beings  
Among Migrant Children in Mainland China:  
Mediated by *Hukou*-based Discrimination and Moderated by *Hukou* Type**

Wei WU, Wen-Hua CAO, & Yuan ZHANG

***Abstract***

*Although earlier research found that school segregation affects the well-being of immigrant children,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effect of hukou-based school segregation on academic and social well-being among migrant children in mainland China.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is association are also unknown. Based o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the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 this study examined whether hukou-based discrimination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ukou-based school segregation and well-being, and whether the direct and mediating effects were moderated by migrant status. The sample of this study comprised 1,226 migrant children from the first two waves of the CEPS.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a) hukou-based school segregation currently exists in mainland China; (b) the propor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 school negatively affects migrant children's academic and social well-being; (c) peer discrimination and teacher discrimination partially mediate this association; (d) migrant status moderates the direct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propor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 school and migrant children's academic well-being as well as the indirect relationship via peer discrimination. Contribution and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hukou-based school segregation; well-being; hukou-based discrimination; migrant status; migrant children*

---

**WU, Wei** (武璋) is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O, Wen-Hua** (曹文華) is a Master's student in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ANG, Yuan** (張媛) is a Master's student in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